



『日本体验』与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徐美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体验』与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徐美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 徐美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61-0883-3

I. ①日… II. ①徐… III. ①日本文学—影响—中国
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3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王应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论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下，在社会要求与外来影响的相互撞击中产生并发展的，它与世界文学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由于此，中国新文学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这当中，探寻中日之间的文化与文学交往，特别是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便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近代以来日本明治维新变革成功，输入西方文化，使“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引得众多中国学人走向东瀛，遂形成从日本“输入”先进文化思潮的热潮。中国新文学诞生亦于此得益甚多。郭沫若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①此说虽不免过誉，但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初期对外来文学的接受状况。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国情相近的日本。这批留日学生后来有相当部分从事文学，有的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

^①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郭沫若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4页。

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深受过“日本的洗礼”，应是有充分依据的，中国作家接受的“日本体验”可以说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夜”，便有梁启超、王国维及周氏（树人、作人）兄弟等走向东瀛，他们在日本汲取“新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对中国新文学的“新质”有过一段探索历程，为中国新文学的催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诚如人们已经指出的：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会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奠定了现代纯文学批评的基础；周氏兄弟则“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学理论，形成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较全面的新文学观，开‘五四’文学思潮先声”^①。此后，大量留学生集结日本，除周氏兄弟外，被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开拓者、建设者的，如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钱玄同、郁达夫、田汉、张资平、郑伯奇、欧阳予倩等，先后到日本留学，继之又有茅盾、夏衍、胡风、李初梨、冯乃超、刘呐鸥等在日本学习或工作过，他们接受、借鉴日本文学新潮，于中国新文学建构产生直接作用。的确，作为20世纪初率先感受世界文明新风的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留日学生从日本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在历史急切呼唤独具眼力的思想文化改革者时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强有力的呼唤者、创造者。作家们以自己的“日本体验”用于本国文学建设实践，必大大有惠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由于处在同一个东方文化圈子中，日本自身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往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可见可及的现实榜样，其创造的诸多新鲜文学样式能率先为中国作家所捕捉，成为直接的借鉴、效仿对象，尤其是文学思潮的接受、影响甚深。仔细审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各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来源几乎都出自日本：如五四时期创造社引进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和浪漫文学思潮，20年代

^① 张炯等主编：《近现代文学编》，《中华文学通史》第5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革命文学”初兴时引入的“新写实主义”思潮，30年代更有大规模的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引入，还有稍后引进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新感觉派）等，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多种新文学思潮受过“日本的洗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种有着深刻影响关系的文学思潮接受现象，我们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应当说，经长时期努力，我国学界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已较成系统，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对日本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亦有所梳理（如国内已有《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思潮史》等著作问世）。这为日本文学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就研究论题而言，立足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开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的论著，绝大部分关注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而很少涉及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双向互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学思潮，最先起源于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接受，日本似乎只是个“中转站”、“二道贩子”。为此，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作家从日本接受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着眼点仍在西方，很少论及日本文学思潮自身对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作用与效应。事实上，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接受西方，恰恰是中国新文学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日本这个“中介”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只是“中转”与传递，日本还有其自身的文学经验可供国外作家参考，中国作家从日本文学中得益者亦甚多，尤其是日本作家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感受与理解常常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这里面就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近年来，对日本文学思潮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影响关系研究滞后的现象，已有所改变，一些侧重于对日本文学与中国新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的结果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许多论题的探讨，如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反思、“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意义探寻等，都有较深层次的开掘，表明研究已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但就总体而言，特别是与西方文学对

中国新文学影响的研究相比,研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影响的论著还是相对较少。从目前研究现状看,学界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与中国新文学宏观方面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观点:(1)日本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吸收西方文化思潮的媒介之一。(2)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潮中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各有利弊。(3)留日学生是日本文学思潮进入我国的“中介”,由鲁迅、李大钊等留日学生发起、指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话剧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等,均与日本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深入探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

但在笔者看来,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切入,研究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应有更为迫切、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目前学界还缺乏日本文学思潮向我国新文学渗透、影响的过程研究,尤其是不同思潮对我国新文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接受效应作出认真的梳理,这就难以对影响关系作出准确、科学的判断;另一方面,文学思潮“作为观念系统”、“作为语言艺术的文艺领域的精神潮流”,“在本体上是一个精神性结构”(陆贵山:《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其在“文学思想”层面上的意义及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文化精神,会对一种文学的生成及其发展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日文化交流语境中产生的文学思潮影响关系,也应是如此。

笔者以为,深入梳理两国间文化与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的影响关系,从文学思潮视角探究此种关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态,并对我国输入日本文学思潮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至少有下列三层意义:(1)从文学思潮角度系统考察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利于中国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新文学作家对日本文学新潮的吸纳,往往呈现出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因此,探寻文学思潮的日本接受源、其生成过程及其最初的表现形态和后来的文学转型,对于探究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特点与其后来的走向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2)通过对一种文学思潮影响下的独特文学样态接受特点的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认

知与理解。要厘清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理性对待日本文学的影响这一事实。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来源,是众多西方文学思潮东渐影响中国的中转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从文学思潮视角切入,就能对这种作用与影响作出深层意义的分析,因为从研究可以发现,接受日本文学思潮,既有西方文化因子的介入,又有东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显出非常独特的意义。(3) 科学评价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总结出其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意义,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给中国新文学作家带来了新的生命感受、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激活了新文学作家建构新文学的诉求;但日本文学思潮也并非尽善尽美,某些思潮(如“新写实主义”思潮、极“左”文学思潮等)还有严重缺陷,不加分析引入,就会产生负面效应。通过翔实的资料对新文学发展中的理论倡导、创作现象进行溯源分析,并通过影响类型、流传途径、接受方式等的考证,不难总结出近现代日本多种文学思潮对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不难剖析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正负效应。这对于有效总结新文学接受外来文学的经验,深化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是不无意义的,同时对当下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及中国文学的“输入”与“输出”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书以《“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题,旨在从文学思潮的接受视角来透析近现代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所谓“日本体验”,是指留日作家在日本期间感受到的对于文学新潮的独特认知与感悟,将此体验与感悟用来审视、观照自身的文学,便可能形成一种对于新文学特有的认知思路;从文学思潮接受的意义上说,则是形成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建构的独特路径、理论形态、呈现方式等的认识。基于此,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梳理日本文学思潮向中国新文学渗透、影响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较为全面地把握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便能在开阔的世界文学思潮视野中探源寻流,探寻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形成的独特路径、方式与

意义。

根据上述研究意图,确定本书研究的整体框架是:在揭示中国新文学发生背景下对日本文学思潮接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描述、论析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文学思潮的输入和接受状况,评估各种思潮产生的接受效应,进而提出中国新文学借鉴日本文学思潮若干问题的反思,它对于总结中国新文学经验所蕴含的意义,以及借鉴外来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等。有鉴于此,本书将在下述问题的研究、论述上有所侧重。

一是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我国作家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引进、接受的其时在日本兴起的多种文学新潮。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背景下,日本的几种主要文学思潮(如个性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都在中国被接受与传播,对此作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便可厘清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多种影响,理解日本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形成的一种重要接受源;从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文学创作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中,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多样复杂性的缘由;梳理日本文学思潮向中国新文学的渗透、影响过程,弄清中国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对诸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分别进行理论发生及创作过程的溯源分析,使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有机整体。

二是通过影响类型、流传途径、接受方式、产生效应等方面的梳理与辨析,总结出我国现代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的某些特点、经验教训。上述日本文学思潮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融通中,其流传途径与传播方式各不相同,产生的实际作用与效应也很不一样,如个性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不能低估,几种主要文学创作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对中国新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某些思潮(如“新写实主义”、极“左”

文学思潮)的引入,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负面效应。对此作出深入论析,有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研究日本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重要的一点似应放在接受效应的探析上,以此方能加深对接受特点的认识,也能深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也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是从思潮入手结合部分创作现象分析,既有助于对思潮影响关系的深入认知,也有利于对特定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走向的深层把握。“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文学思潮的研究,不能离开“创作”本体,探究一种文学思潮的生成、流播过程,当然也紧密联系着创作。本书审视日本每一种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都结合着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对思潮的透视与呈现。其中对日本文学思潮施加最显著、最直接影响的创作现象,如创造社创作、左翼文学创作、新感觉派小说等,给予了重点论述。这样做,既能深化对文学思潮的认知,也能使思潮研究真正落到实处。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背景下的日本文学思潮接受	(1)
一 中国近现代“留日潮”形成的历史动因	(1)
二 日本文学新潮与中国文学变革诉求的契合	(9)
三 留日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20)
四 中国新文学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的阶段呈现	(41)
第二章 “日本体验”与个性主义思潮的吸纳	(55)
一 近代启蒙思潮与“人的意识”的自觉	(56)
二 日本白桦派与周氏兄弟的“人的文学”	(63)
三 周作人“性爱论”的引入与个性解放的突破	(71)
四 创造社作家接受个性主义思潮的强势凸显	(80)
五 “日本体验”之于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意义	(97)
第三章 现实主义思潮的全面影响与接受效应	(103)
一 接受日本现实主义思潮的一般形态	(104)

◎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

- 二 引进“新写实主义”理论产生的变异····· (111)
- 三 左翼思潮和无产阶级文学输入的主渠道····· (115)
- 四 日本左翼思潮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的正负面效应····· (127)
- 五 独特形态:胡风主观现实主义的日本来源····· (134)

第四章 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视角与发展趋向····· (144)

- 一 新文学“前夜”的期从日本引入浪漫元素····· (145)
- 二 接受视角:对日本浪漫文学渗透社会意识的认同····· (152)
- 三 同步趋向:文化同源的“泛神论”思想的移植····· (164)
- 四 创造社作家对“五四”浪漫文学的强力推动····· (169)
- 五 “自叙传”小说的直接借鉴:“私小说”····· (182)

第五章 现代主义思潮的时断时续的影响····· (190)

- 一 引进新浪漫主义:中国现代主义的最初接受源之一····· (190)
- 二 “日本体验”与引入唯美主义、象征主义····· (202)
- 三 30年代:日本新感觉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215)
- 四 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现代主义创作潮的推动····· (223)

第六章 借鉴日本文学思潮若干问题的反思····· (240)

- 一 重视借鉴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要接受源····· (241)
- 二 日本作为西方文学思潮“中介站”的作用与意义····· (253)
- 三 借鉴日本文学思潮:接受中的选择、差异与超越····· (259)
- 四 揭示日本影响的正负面效应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 (268)

结语 借鉴外来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 (276)

- 一 文化的多维性与中国文学发展多样文化选择的必要性····· (276)

二 吸纳外来文学思潮与尊重自身文学个性、优势的结合	(278)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284)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背景下的日本文学思潮接受

考察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深重影响，首先需要探究的是此种影响关系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对此作深入探析，可以发现：中日互为近邻、文化同源为中日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而在文学思潮上形成独特的输入、接受关系，则取决于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特定需要和可能。因此，从中国新文学的背景上探寻此种影响关系的成因，揭示中国新文学诞生发展对于日本文学新潮的诉求和接受的可能性，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新文学发生的“背景”描述意义就在于：探寻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日本接受源、其生成过程及其最初的表现形态和后来的文学转型，对于探究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其产生不同的效应对后来的文学走向也有着不可漠视的意义。

一 中国近现代“留日潮”形成的历史动因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相似性，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渊源颇深。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输出”，因而在文学、艺术、宗

教、哲学等广泛的文化层面对日本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近代以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自 19 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变革成功以后，吸取世界先进文化思潮，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晚清时期的中国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昔日的“老大”中国反而处于下风，招致被动挨打的局面。甲午战败，是最惨痛的教训。由此使中日之间的文化对比也发生了倾斜，以往的“输出/输入”格局必有所变化。近代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从封建帝国的衰落中看出了其亟待改革的需要，也从一衣带水邻邦的迅速崛起，看到了改革“老大中国”值得仿效的方略，于是放下架子，回过头来向从前的“学生”学习，从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便成为一种自觉之举。

标志着近代中国已造成向日本学习较大声势的，是颇具规模的“留日潮”的形成。这为近现代大规模的中日文化交流格局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

中国“留日潮”的初次形成，始于戊戌年间的变法维新。由于变法—改革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师夷长技”以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已成不二选择。学习的途径，可借助于“西书”、“西学”的输入，但这种慢吞吞的“西学”输入方式，已难以适应“急切”改革的需要。所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就力主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费”，语言又相近，能够获得“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①正是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下，又加以权要重臣的力荐，戊戌以后留学日本便蔚然成风。

1896 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招募 13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留学日本的先河。资料显示，自戊戌变法的 1898 年至爆发辛亥革命的 1911 年，留日学生的数量基本上呈逐年递增态势，辛亥前几年，虽稍有所减少，但

^①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7 页。

仍保持相当数量。具体留日学生数如下：1898年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人，1901年266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1905年约8000人，1906年约6000人，1907年6797人，1908年5217人，1909年5266人，1910年3979人，1911年3328人。^① 这里显示的正是所谓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1908），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中，遂有一个特定时期内颇具规模的“留日潮”的形成。这股“留日潮”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运动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②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大撞击中，频频袭来的欧风美雨曾给国人，尤其是知识文人带来极大的心灵震荡，仰慕“西学”几乎成为一股不可抑制的潮流。然而，近代中国的知识文人获取“西学”的途径并不直接取自欧美，而是日本，中国留学潮的形成，首选之地是日本，这是值得深究的。考量近代中国留学潮在日本形成，应当有多重动因，笔者以为下述三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一是中日互为近邻、文化同源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空间距离近，更兼中国与日本有地缘和文化上接近的优势，风俗习惯颇多相似，文化也有相似性，这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带来诸多有利条件。由于历史形成的因素，在长时期内，两国人民相互往来已形成习惯，晚清的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还不需要签证，这无疑会向这个邻邦取经提供方便。而且因生活习惯相近，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大体相近，

① 李协京：《近代中国的赴日留学生：学术研究领域无亮点》，《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两国间的物价也较为接近。据 1934 年的汇兑率，70 元面值的中国纸币可换 10 日币，因此，留学东洋的费用不仅低于西洋，而且有时跟在中国的消费相当。这无疑为中国国民走出国门，远涉“东洋”，大大开启方便之门。此种近便关系，就能取得如张之洞所说的“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从“文化同源”考量，中日两国在文字、文学、文化方面能得以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其最大的便利莫过于同属汉字文化圈这一事实了。同属东方文化圈，且又处于同一的汉字文化圈中，同质多于异质，价值取向大多是相同或近似，两者的冲突与融合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为留日学生接受日本文化和文学提供了可能。梁启超在 1897 年发表《变法通议》，其中《论译书》一节提到了翻译日文书籍的种种益处：“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始，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近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利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① 梁启超所说的“同文之国”，即文字同出一源，可谓典型例证，最能说明“文化同源”对两国文化交流带来的便利。这里，他说黄公度（遵宪）谓日文“可不学而能”，固然有些夸张，但较之西文，日文较易学习与掌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留日学生便从中受惠甚多。

二是中日之间“政体民情相似”，取学日本可收即时参照之效。

除了近便和速效，晚清的学者，还包括官员、政治家，鼓励学生赴日留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取学日本可收学习日本经验、改革中国的即时参照之效。正如 1903 年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与日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6 页。